

陶弘景集校注

〔南朝梁〕陶弘景著

王京州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13.912
T312

陶弘景集校

〔南朝梁〕陶弘景 著 王京州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陶弘景集校註 / (南朝梁) 陶弘景著；王京州校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325-5353-2

I. 陶… II. ①陶… ②王… III. 陶弘景 (456~536)—文集 IV. I213.9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9) 第069821號

陶弘景集校註

[南朝梁]陶弘景 著

王京州 校註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顥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0.875 插頁 4 字數 200,000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300

ISBN 978-7-5325-5353-2

I · 2114 定價：32.00 元

PDG

前 言

陶弘景（公元四五六——五三六年）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他熱衷仕進，在政治的漩渦中幾經沉浮，後來激流勇退，歸隱山林，成爲名副其實的道教徒。他將生命與信仰融爲一體，廣開道館，招納門徒，苦練仙丹，整理道經，與其說是一名盲目的宗教信徒，不如說是一位清醒的宗教學者。陶弘景還是一位醫學家，他執著於求真的科學精神實已超越了宗教的樊籬。作爲南朝的著名作家及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陶弘景雖然在生命的前後半段分別投身於政治和宗教，而他對政治和宗教的態度却是異常複雜的，既親近，又疏離；文學和科技則自始至終伴隨著陶弘景，爲他立名垂範，讓他心有常依。

—

陶弘景早年服膺儒學，偏重名教，對世俗功名充滿熱望。《南史·陶弘景傳》稱他「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漢留侯張良功績卓著，名聲顯赫，同時深知鳥盡弓藏的道理，因而對榮華富貴毫不留戀，功成身退，他的傳奇人生成爲陶弘景企慕的典範。陶弘景在《與從兄書》中表白心迹說：

昔仕宦應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好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請，此頭顱可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

四十歲左右登上尚書郎的高位，再求一外任，像謝靈運那樣縱情於山水之間，選好名山福地，便徹底遠離政治，這正是陶弘景依照張良的行止爲自己設計的人生道路。然而遺憾的是，他一直碌碌無爲，志不得伸，宋末爲諸王侍讀，入齊除奉朝請，官職卑微，名實兩無。仕途上的坎坷不平讓陶弘景終於萌生退意，於永明十年拜表解職，棲止於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

陶弘景胸懷鴻鵠之志，何以正值盛年便遽然引退，永訣仕宦？政治理想的破滅無疑是直接原因：在等級森嚴的特權社會裏，既然得不到權要的賞識，進身乏階，繼續棲身官場，已於事無補，他在《與從兄書》中正是用這條理由爲自己辯解的。然而這只是陶弘景遠離仕途的表層原因，厭倦官場和全身避禍才是真正原因所在。

陶弘景拜表解職之前，還有一段插曲，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云：

(陶弘景)乃往與王晏語別，晏云：「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旨，坐貽罪咎，便恐違卿此志，詎可作？」先生默然良久，答云：「余本徇志非爲名，若有此慮，奚爲所宜。」於是即不詣省，直上表陳誠。

「余本徇志非爲名」，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上作「吾本爲身不爲名」。身指性命，名爲名聲，「爲身不爲名」透露了陶氏引退的暗中消息，其中不僅有對道家思想的認同，更有全身避禍的政治遠見。

南朝宋齊年間，社會、政治動亂不安，史有明文。這種局面同君主的昏暴有莫大關係。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宋齊多荒主」條指出：「古來荒亂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齊兩朝之多者。其無道最甚者，其受禍亦最烈，若僅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則雖亡國而身尚得全。」對於處處險惡、變幻莫測的政局，士大夫們抱有微妙而複雜的心態，是不難理解的。

陶弘景正是生活在這樣的亂世之中，他雖然沒有引禍上身，然而却不止一次地看到好友在政治漩渦中遇禍。丹陽尹劉秉對陶弘景有知遇之恩，陶弘景追隨劉秉期間與其次子劉俣相識，二人互推知己：他們有著同樣的人生經歷，在生活中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他們又有著相同的志趣和愛好，雅好文籍，日夜研尋。昇明元年，袁粲起兵反叛，劉秉參與其事，陶弘景和劉俣在劉秉帳下供遣使，後來事泄兵敗，陶弘景得以全身而退，而劉俣却不幸遇難。劉俣死後，陶弘景歎息道：「人無愚智，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喪。」（《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上）劉俣生前親友都不敢為他收葬，只有陶弘景不怕受到牽累，為劉俣收殯、瘞葬並且查砌舊墓，《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稱：「營理都畢，自此棄世，尋山而止。」以此看來，陶弘景告別官場與好友劉俣的死有著深刻的聯繫。

陶弘景上表辭職雖然是為「身」不為「名」，而這一事件在當時朝野上下却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讓他名聲鵲起，被相送者譽為「孤鴻」，這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據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記載：

先生既命舳東川，齊公卿並送於征虜亭，舉酒揮袂，皆云：「江東比來未有此事，乃今日見之，二疏聚金歸田園，亦何得稱高？」先生乃曰：「秦皇漢祖，楚羽吳策，並勢橫海外，雄架天維，寸氣不續，則為一丘之壤，況乎二三

子之徒也。高居雲嶺，訪真幽府，正爲此耳。」日暮乃別，執御者亦歔欷。送者相謂曰：「孤鴻已摩天去，吾儕戀稻粱，跳躋網羅中。」

陶弘景走在了時代的前沿，當旁人爲了稻梁之謀苦苦掙扎於官場中時，他全身遠退，隱迹山林；當旁人望見蕭衍軍次石頭而內懷猶豫之時，他「亟陳圖讖，貽書贊獎」（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當旁人仍在道教的藩籬中左衝右突時，他衡論三教，甚而皈依佛門。陶弘景是標新立異的，而在標新立異的背後，則是他擺脫舊我、追求新我的超越精神。

二

儒釋道三家在思想、教義、禮俗等方面的不同，使它們之間常有激烈的論辯和鬥爭，但作爲鼎足互補的思想意識和人生道路，三者也可以互相調和，爲士大夫一并接受。陶弘景正是一位兼修三教的代表人物，他兼具儒生、道士、佛徒三重身份。早年服膺儒學，政治理想破滅後，轉而隱迹求道，成爲上清派的重要傳人；知命之年，又皈依佛門，佛道雙修。在每一種身份的背後，陶弘景都是淵博而嚴謹的學者，有著「一事不知，深以爲恥」的治學精神，珍惜光陰，勤奮著述，在宗教、科技、中醫、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均有卓越貢獻。

陶弘景自幼誦讀《周易》、《毛詩》、《論語》、《禮記》、《孝經》等儒家經典，在他的著述中，也不乏爲這些經典作注的作品，如《孝經論語序注》十二卷、《三禮目錄注》一卷、《注尚書毛詩序》一卷等。可惜這些

作品都亡佚了，以致我們今天已無法窺見他有關儒家學說的宏論，但他對政治的熱情和對蒼生的憐憫，正可反映他的儒家情懷。

陶弘景年僅十歲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從鄉人手中得到一本葛洪的《神仙傳》，書中描繪的神仙世界深深吸引了年幼的陶弘景，他不分晝夜地研讀，並意味深長地說：「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十五歲作《尋山志》，文筆老成，辭深意遠，文末稱「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已現韜隱端倪。隱居之前，陶弘景曾於齊武帝永明年間，跟隨孫遊嶽咨稟道家符圖經法。孫遊嶽上承陸修靜，下傳陶弘景，是六朝道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當他奉詔主持興世館時，一時名流紛紛趨附，著名者有孔稚珪、劉孝標、沈約等，據說只有陶弘景得到了真傳。然而，陶弘景並不滿足於孫氏傳授的道經，又遍游江東諸郡名山，謁見隱逸道士，訪求散佚的楊羲、許謐及許翹的上清經訣手迹。這一系列活動爲其最後真正成爲上清派的重要傳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正式歸隱後，陶弘景便著手整理經藏，弘揚上清經法，先後編著了《真誥》、《登真隱訣》、《真靈位業圖》等道教經典。他還開設道館，廣收門徒，與衆弟子一起苦心經營茅山。《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稱：「初先生以大茅中茅間有積金陵，其地可修上道，乃於嶺西立華陽上下館。」在《十賚文》中，陶弘景描繪了他與弟子陸敬遊創建華陽館的艱辛：

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斫幹，越壘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慊，寧顧飢寒之弊。棟宇既立，載離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

上清派後來被稱作茅山宗，源于陶弘景及衆弟子數十年的苦心經營，使茅山事實上已成爲上清派的中心。任繼愈《中國道教史》稱茅山宗「這一道派的形成，標誌著自葛洪以來江南士族道教徒以神仙道教改造舊天師道團，創立官方化的正統道教的完成」，而作爲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以及茅山教團的實際創建者，陶弘景在道教史上無疑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南朝時佛教在江南盛行，陶弘景從小就沾濡其風。他的祖父和母親都尊崇佛法。在陶弘景的友人中，信佛者比比皆是，如篤信佛教的沈約，晚年佞佛的梁武帝，身在佛門的慧約、昱鸞等。親友的信仰對陶弘景最後皈依佛門必有一定影響。

據盧仁龍《陶弘景與佛教史實考辨》考證，陶弘景於天監十一年或十二年接受五大攝戒，公開表示依順佛門。正式入佛之後，陶弘景在朱陽館設立佛堂，又修建菩提白塔，還自稱勝力菩薩，以表示對於修行佛法的誠心。他的雙修之義在詩文中也多有體現：

崇教惟善，法無偏執。（《授陸敬遊十賚文》）

東位青壇，西表素塔。（《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茅山長沙館碑》）

《陶弘景集》中有兩處援引佛經：《補闕肘後百一方序》「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又《難鎮軍均聖論》「謹按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兩處引文對於佛經的態度都是恭敬並贊同的。《陶弘景集》中還有不少地方，雖不是直接引用佛經，却化用了佛教的語言，如「欲界」，《與謝中

書書》「實是欲界之仙都」；如「業」，《告逝篇》「緣業久相因」，《許長史舊館壇碑》「挺命所基，緣業已久」；如「寂滅」，《訪仙佛兩法體相書》「亦畢竟寂滅矣」；如「弘誓」，《許長史舊館壇碑》「皇上乘弘誓本力」。引用佛經、化用佛典反映了陶弘景對佛法相當熟稔，並且抱著認真學習的態度。

對於「一事不知，以爲深恥」的陶弘景來說，通曉佛典，無疑是發自内心的要求。久而久之，爲其所化，走上佛道雙修的道路，正在情理之中。他從受佛戒到壽終，一直精行佛道雙修之法。臨終《遺令》云：

即沒不須沐浴，不須施床，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祿裙及臂衣，鞣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燃燈，旦常香火。

不僅讓黃冠道士與緇衣道人同佐喪事，還吩咐遺體置棺，道冠加首，衲衣蒙身，真可謂兼修二道，至死不輟。

三

過去學者大多把目光停留於陶弘景在道教思想史和科技史的地位上，對他在文學藝術上的卓著成就較少注意。事實上，他不僅著述等身，且是一位文章聖手，可以同抱朴子相提並論。他的詩文辭采宏麗，意境俊脫，「如灑墨水，盡成桃花」（張燮《重纂陶隱居集序》）。今存陶弘景作品中最爲後人稱道的是

一詩一書，即《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與《答謝中書書》，兩篇均為短制，表面上看都是酬答他人的應用文字，且主題均為山水：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在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山中白雲」已成為文學史上著名典故，張炎《湘月·賦雲漢》「為問山中何所有，此意不堪持寄」正用此典，其以「山中白雲」命名詞集也是取用此典而有所寄託。陳與義《冬至二首》之一「石爐深炷火，撩亂一榻書。只可自怡悅，不堪寄張扶」，雖未取「山中白雲」事，模仿的痕迹却是顯然的。《答謝中書書》被廣泛采入《藝文類聚》、《駢體文鈔》、《六朝文絜》、《古文筆法百篇》、《南北朝文舉要》及《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等類書與選集，並得到一致好評，其影響深遠之程度比起《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毫不遜色。

《六朝文絜》評《答謝中書書》云：「得此一書，何謂白雲不堪持贈？」顯然是借《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而言。詩含蓄凝練，文筆墨鋪展，自然是受文體的限制，但詩中暗含幽默調侃的意味，則當與酬答的對象有關。

謝中書即謝覽，他和陶弘景是忘年交，二人交往至深，陶弘景在書信中援筆描繪山川美景，一吐隱逸生活的怡然之樂，是很自然的。而陶弘景對詔問「山中何所有」的齊明帝則素無好感，從未以青眼加

之。史稱齊明帝恒有隱疾，潛通道術，對當時的玄中宗師陶弘景禮敬有加，動輒予以賞賜。陶弘景不耐其煩，於是建造三層樓，自住最上層，弟子居中，下層接待賓客，塵外雜事，盡可能由童僕阻擋，該詩當作於此時。「自怡悅」、「不堪寄」兩句中隱含的鄙夷和不屑，便不難理解了。

另外，《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除第二句「嶺上多白雲」「上」字「白」字均為仄聲外，其他平仄粘連基本已合乎近體詩的要求；《答謝中書書》用語清新灑亮，音調錯落有致，並可見陶弘景的創作深受永明體講求聲律的影響。

比起《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答謝中書書》的膾炙人口，《寒夜怨》、《尋山志》則多少顯得落寞，然而後二篇也不失為優秀之作，淹没不聞實在不是作品本身的緣故。

《寒夜怨》寫閨怨，載於《樂府詩集》卷七六：

夜雲生，夜鴻驚，淒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華沉照帳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
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前七句寫景，後四句抒情，由景生情，情景交融。其境界與李白《菩薩蠻》有異曲同工之處：陶詩「夜鴻驚」，李詞則「宿鳥歸飛急」；陶詩「空山霜滿高煙平」，李詞則「寒山一帶傷心碧」；陶詩寫景由細微到宏觀再到細微，李詞則由宏觀到細微再到宏觀；陶詩結尾用白描手法，則不如李詞「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以境界結束來得含蓄。全詩通過「夜雲」、「夜鴻」、「空山」、「高煙」、「寒月」、「寒風」等意象，成功地

塑造出一片蒼茫、無限悲涼的境界，可以說正是李白《菩薩蠻》、《憶秦娥》等名作的先聲。楊慎《詞品》卷一將本篇與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辭》並列，稱「絕妙填詞，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當是有感於此。

陶弘景早年爲了躋身上層社會，獲得統治者的賞識和提拔，不得不像當時抱有同樣目的的文人們一樣獻賦，他的《青溪宮賦》、《武進宮頌》等先後獲得好評，在任宣都王侍讀期間還參與諸王宴會，憑《水仙賦》一文震驚四座，令沈約、任昉等人爲之激賞。然而以上作品多是應制文章，很難融入作者的真情實感，《尋山志》則不同，它作於作者年僅十五歲時，感情充沛而真摯。

《尋山志》題名爲「志」，實際上是駢體賦。史傳言陶弘景年少便有養生之志，而他早年的出世之想恰好完整地體現在《尋山志》中。作者通過尋山的過程和一系列的意象，使遠離塵囂、追求自然的主題逐步凸顯。全文如雲鋪水瀉，用語形象而優美，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山水美文。佳詞麗句，俯拾皆是：

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檐，暮獸爭來。

右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滋滋以垂露，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赴水，鷺軒軒而歸田。

文末夾入一段騷體，「去采芝兮入深磽，深磽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無曙，深澗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鳥迷蘿兮纊纊，雲停松兮紛紛；停雲遊兮安泊，離鳥棲兮索群」，使得整篇

文章更顯搖曳多姿。

陶弘景的文章有早期、晚期之分，兩期文風有巨大的轉變，界限大約為歸隱（齊武帝永明十年，公元四九二年）前後。早期的陶弘景寫了不少入時之作，文體採用當時流行的駢文形式，內容多為描寫山水、吟詠性情和抒發懷抱。氣勢恢弘，風格典雅，以《尋山志》、《答謝中書書》為代表。後期陶弘景為文很少再用駢體，自成一家。此期文章以論說文為主，辨別義理，分析入微，《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難鎮軍均聖論》是代表作。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討論形、神關係，發前人之所未發：「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由於作者兼修佛、道二教，所以對二者之間的同異能辨別得如此細微。《難鎮軍均聖論》難佛，《道藏》的編者未審文意，以為與佛教有關，因此有意割棄。全文針對沈約《均聖論》，逐字逐句論難：「謹按佛經，一佛之興，動逾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既闔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為此，沈約以《答陶隱居難》回應，前後三篇文章俱載於《廣弘明集》，二人之間的論點針鋒相對，論爭十分激烈。通過論爭探討佛理，對於理論的深化大有裨益。

此外，與梁武帝討論書法的五篇書信和《本草經集注序》、《藥總訣序》、《登真隱訣序》等序言，事實上也應歸入論說文一類。在後期作品中，還有為數不少、名目繁多的應用文，如各種碑銘、《十賛文》、

《請雨詞》、《遺令》等，除《告逝篇》外，《許長史舊館壇碑》、《吳太極左官葛仙公之碑》、《茅山長沙館碑》諸碑銘文等，亦摻帶著濃厚的道教色彩。

在上梁武帝論書啓中，陶弘景有一段著名的才鬼頑仙之論：

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

人生有涯，不能窮盡所有的知識，這是多麼巨大的遺憾。可悲的是人們不懂得珍惜時間、知難而進，只是得過且過，追求欲望的滿足。即使做鬼，也要做個才鬼，強過那冥頑不靈的神仙！「一事不知，以爲深恥」的陶弘景珍惜光陰，博學多能，有著十分嚴謹的求知態度。他雖然是將餘力用於詩文創作，然而從他「才鬼勝於頑仙」的論調中可以看出他很重視文學才能和詩文創作。陶弘景的詩文理辭並重，風格典雅，理應在六朝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四

陶弘景一生著述宏富，可惜大部分已亡佚，流傳至今的尚有《真誥》、《登真隱訣》、《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補闕肘後百一方》、《周氏冥通記》、《養性延命錄》、《古今刀劍錄》、《華陽陶隱居集》等八種，其中半數以上屬道教類著作，收錄於《正統道藏》，最後一種《華陽陶隱居集》亦見錄於《道藏》，其內容則更多與文學相關。道藏本《華陽陶隱居集》是《陶弘景集》的傳本之一，然而只是輯本，原本《陶弘景集》早已

亡佚。陶弘景在文學史上名聲不振的原因，可能正與《陶弘景集》的亡佚和輯本的流傳不廣有密切關係。

《隋書·經籍志》著錄《陶弘景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只存《陶弘景集》二十卷而無《內集》，可見《內集》亡於唐代；由於宋代重要的目錄書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均未見有關《陶弘景集》的隻言片語，可推知至北宋時《陶弘景集》已全部亡佚。

南宋之初，輯佚本開始出現。考此本問世於南宋紹興年間，初爲王欽臣、曾恂輯錄，繼而由傅霄編集，陳桷校勘鏤板。輯佚本甫經出現，即獲學林珍愛，篇卷雖十不存其一，而「殘膏剩馥，實足以沾溉後人」（阮元《宛委別藏·華陽陶隱居集提要》）。從明代開始，大量的文人學士與《陶弘景集》結緣。爭相傳抄者，有文嘉、葉奕、史臣紀、馮彥淵；校訂刊刻者，有黃注、朱大英、毛晉、阮元。張燮、張溥、嚴可均等人孜孜於重輯，丁丙、繆荃孫、傅增湘等則汲汲於校勘。迄今流傳的版本不下十餘種，曾爲其作題記序跋的人多達數十家。

儘管如此，《陶弘景集》的整理仍未能達到盡善盡美，各本都難掩或輯錄有缺、或校勘不周的瑕疵。時至今日，學界尚無人對《陶弘景集》的各種版本進行全面校理，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校注本問世，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書是陶弘景詩文的重新輯錄本，書名從《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陶弘景

集》，而附以「校注」二字。

通常的古籍整理方式是以善本作為底本，校以他本，增輯的部分附在後面。然而從南宋開始出現的各種《陶弘景集》都是輯佚本，係輯校者從類書、總集等典籍中輯出，而其所利用的大部分典籍，我們今天依然能看到，並且有很多善本，如《藝文類聚》、《法書要錄》等。既然現存的都是輯本，並且內容都不全，與其利用殘缺的現成版本，則不如根據善本重新輯錄。除了勾稽原始出處，利用類書和史籍進行比勘外，我還在各種《陶弘景集》輯本之間展開勘對工作，在理清各本不同源流關係的基礎上，從中遴選幾種最具代表性的版本作為參校本。各篇出處及用以比勘之本各不相同，分別於各篇頭條注文中標明。鑑於《陶弘景集》從無人注釋，而一個完整的校注本又亟為學界所需，所以我不揣謬陋，嘗試全面校注《陶弘景集》。囿於學力和水平，疏漏謬誤，知所不免，歡迎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王京州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